

虚拟经济背离与回归实体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李连波

【内容提要】金融化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的结果，传统的解释往往将之归因于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后过剩资本在金融领域寻找出路。这种解释主要从周期性而非长期性的视角来理解金融化，忽视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和金融创新的长期发展。资本主义虚拟资本积累本身就具有脱离实际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中，虚拟积累独立于现实积累的可能性已经具有了现实性。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催生了一个食利者阶级，它们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占据统治地位。从资本的概念本身来看，资本具有摆脱一切物质束缚而实现自由逐利的欲望，即通过自主化运动逐渐远离价值增殖的物质基础。然而，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最终会回归其货币基础与价值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金融化 资本自主化 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作者简介：李连波（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836）。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对立统一的关系^①。一方面，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最终依据，虚拟经济应服务而非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虚拟经济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具有摆脱一切物质束缚而无限膨胀的趋势。然而现有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第一个方面，即强调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引导虚拟经济更好发挥积极作用，对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分析则相对较少。

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一些学者提出的“资本自主化”等概念，揭示虚拟经济背离与回归实体经济的内在逻辑。

一、金融化的周期性与长期性

经济金融化是过去 30 多年美国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成为很多经济学家近年来重点关注的问题。后凯恩斯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和调节学派等从多个方面对金融化问题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将金融膨胀与实际资本积累遇到的障碍联系起来，将金融膨胀视为对经济停滞的自然反应；有的学者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出发，讨论了食利者复兴的问题，认为一个食利阶层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外《资本论》研究新进展”（18CKS0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目前学界对虚拟资本、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界定存在争议。我们认为，虚拟资本应当包括以下三个部分：马克思所说的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纸质复本），由资本化原则造成的每一笔有规则的货币收入所对应的幻想的资本，以及由现代金融创新所创造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和金融衍生品等。虚拟经济则是与虚拟资本运动相关的经济活动，后者虽然没有价值，但可以通过交易获利。实体经济应当从产业资本循环的角度定义，指的是那些依次经过购买、生产、售卖三个阶段，参与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或者是其中某个阶段的职能独立出来形成的经济活动。

兴起并获得了经济统治权力；有的学者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将公司治理中股东价值标准的确立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联系起来；还有学者沿着希法亭的思路，用“垄断金融资本”等概念代替金融资本概念，将经济金融化视为垄断金融资本的全面扩张。此外，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研究日常生活的金融化问题。这些学者主要聚焦于个体的主体性重构，剖析了个体金融化行为转变背后的金融价值、观念和话语的转变。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微观层面主要关注企业和家庭的金融化，缺乏对微观个体金融化转变的深入分析，而这正是从哲学和文化角度考察个体金融化转变的学者的旨趣所在。我们认为，虽然金融化的哲学和文化研究揭示了金融化的重要内容，但并未超出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范围，因为个体日常生活金融化的实质无非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现有的研究试图超越经济金融化的表面现象，将其与资本积累的深层问题联系起来，加深了我们对金融化问题的理解。

目前西方学者并没有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金融化定义，对于其成因也存在多种解释。克里普纳的定义被广为引用，她将金融化定义为一种资本积累模式，金融化意味着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渠道产生^①。“经济停滞—金融膨胀”也成为金融化最为流行的解释。例如，巴兰与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一书中论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趋势和大量过剩资本的产生过程。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下由于生产力进步与垄断的存在，资本家积累了大量经济剩余；巨大的剩余无法被吸收，不能重新作为资本去追逐利润，经济最终会陷入停滞，这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金融资本的扩张是过剩资本的吸收渠道之一，金融化是对生产停滞的反应^②。这种“经济停滞—金融膨胀”因果推论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如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指出，金融积累与实际积累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的逻辑关系，将生产停滞与金融膨胀归结为直接因果关系，忽视了金融与生产之间复杂的中介过程^③。

除拉帕维查斯指出的问题以外，我们认为，金融化的“经济停滞—金融膨胀”解释忽视了虚拟资本的积累或虚拟经济的发展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这实际上涉及对金融化的两种不同认识，即金融化是周期性现象还是长期性现象。如果按照阿瑞基的解释，将金融化理解为周期性现象，那么金融化就是每个跨越百年的体系积累周期衰落的结果^④。这种解释忽视了资本主义商品化、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也忽视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和金融创新的长期发展。虽然资本主义积累的周期性使金融化也带有周期性的节奏，但每个周期结束后，下一轮的金融化会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化不只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更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长期趋势。当然，这里更多强调的是“量”的变化，而非“质”的转变；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长期发展和虚拟资本运动自主性的增强，即其独立于现实积累的能力的增强。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金融化是一个与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发展相联系的经济现象，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的结果。“所谓金融化，就是人们日益以货币或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形式进行资本和收入的占有与积累，相应地人们通过这些媒介形成资本和收入上的占有关系。”^⑤建立在全面的商品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导致普遍的商品化与货币化，这成为信用制度产生的基础。现代银行制度的发展使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变得非常容易。20世

① 参见（美）格·R. 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下），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7期。

② 参见（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73-82页。

③ Costas Lapavistas, “Theorizing Financialization”,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Vol.25, No.4, 2011.

④ 参见（意）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9页。

⑤ 陈享光《储蓄投资金融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8页。

纪70年代金本位制取消，金融资本积累和扩张最后的物质束缚终于被打破。20世纪80年代起的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则重塑了整个金融体系，促进了虚拟资本的发展，使货币资本伴随着货币资本化而不断积累，并且日益采取了虚拟资本的形式。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些变化不只是周期性现象，更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趋势。其结果是当代虚拟资本的积累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虚拟经济的发展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同时催生了一个实力强大的食利者阶层。当然，金融膨胀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和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最终会回归其货币基础与价值基础。

二、马克思的两种分析思路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信用的作用，信用成为资本积累的有力杠杆；另一方面，信用又满足了资本摆脱一切物质束缚实现无限增殖的欲望，促进了虚拟资本的积累，使资本积累日益摆脱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虚拟资本积累本身就具有脱离实际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分析已经蕴含了这一点。关于虚拟资本运动的独立性的来源，马克思有两种分析思路：一方面，从最抽象的意义上，马克思揭示了货币产生后出现的双重积累体制相背离的可能性，即虚拟积累独立于现实积累，从而产生过度积累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考察生息资本运动时采用了一种阶级分析思路——在资本家阶级中区分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前者有取得统治地位的可能性。

对于第一种分析思路，分析的起点应当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因为货币问题一方面联系着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联系着资本积累问题。作为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货币的产生并未消灭商品中的内在矛盾，只是使其发生了转移，使内部对立取得了外部对立的表现形式。“由此可见，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商品相对立而独立；由手段变成目的；通过使商品同交换价值分离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使交换分裂，来使交换易于进行；通过使直接商品交换的困难普遍化，来克服这些困难；生产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交换，就使交换在多大程度上与生产者相对立而独立。”^① 货币产生后出现了双重积累体制，即现实积累与虚拟积累。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第二种积累的独立性增强了，而且作为手段的货币成为目的本身。从借贷资本的产生之初就产生了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在现代有了更明显的表现：一方面，借贷资本的运动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将货币作为资本贷放出去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存在为前提，“货币作为资本贷放……要有一个前提：货币实际上会当作资本使用，实际上会流回到它的起点。因此，货币作为资本进行的现实的循环运动，就是借入者必须把货币偿还给贷出者的那种法律上的交易的前提”^②。另一方面，借贷出去的货币资本却并不必然从事实际价值的创造活动，甚至不必从事资本主义活动。它可以借贷给消费者，可以用于奢侈品消费，也可以用于纯粹的投机活动，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是作为货币支出，还是作为资本预付，只是货币的不同的用途”，“如果借入者不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来使用，那是他的事情”^③。从第一个方面来说，资本主义信用关系隶属于生产关系，借贷资本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它在实际积累中发挥了作用。从第二个方面来说，借贷资本的运动又有自己的独立性，试图摆脱实际价值的创造而实现增殖。借贷资本的积累，金融资产的增加，并非一定意味着现实资本的积累，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真正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10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1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8、391页。

什么程度上是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标志,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标志,又在什么程度上不是这种标志呢?”“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①在产业资本主导的条件下,从现实循环中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必然要返回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否则其营利性就无法实现。然而,在列宁所处的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金融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银行的作用增强,成为万能的垄断者,使货币资本与生产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经济金融化使第二个方面得到了充分发展,借贷资本不再单纯服务于生产领域,而是谋求更广阔的逐利空间,不仅在金融领域内循环获利,还向家庭渗透,以工资收入者为榨取利润的对象。

对于第二种分析思路,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滋生了一个食利者阶层。这个阶层一直在谋求建立自己的统治,企图抓住任何实体经济削弱带来的机会,令实体经济屈服在自己的无尽贪欲之下。“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货币资本家阶级也增长起来;第一,退出营业的资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数和财富增加了;第二,信用制度更发展了,因此,银行家、货币贷放者、金融家等等的人数也增加了。”^②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时候分析了高利贷资本与借贷资本的区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利贷资本必须得到规训,转变为服务于生产资本的借贷资本。金融化的发展使借贷资本日益摆脱了这种规训,恢复了高利贷资本中腐朽的一面,宣告了食利者的复兴。马克思考察了生息资本是如何获得其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在分析过程中,马克思首先区分了货币资本家(那些拥有货币权力的人)和产业资本家(那些组织剩余价值生产的人),并将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放到了中心位置。金融化的发展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相对于产业资本来说,金融资本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不可避免地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催生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与产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比如马克思时代)相比,金融资本有迥然不同的运动规律”^③。

伊藤诚和拉帕维查斯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来自古典经济学,“以古典分析的态度,马克思把利息和企业利润看成是引起资本家阶级分为两个不同并对抗阶层:借贷资本家和经营资本家的收入的来源。一个阶层占有得越多,留给另一个阶层的则越少”。他们质疑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这一方法的问题是它试图以一种理想的绝对方式,来论证生息资本的性质,并想通过利息来确定一个社会阶层……马克思关于借贷资本是其所有者以它实现了生产剩余价值的使用价值之后归还为条件的让渡的假设,在‘借贷’与‘经营’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上是不可能从逻辑上证明的”^④。大卫·哈维指出,马克思其实走得更远,事实上将起初表现为阶级派系之间关系的东西内化到个体资本家的人格特征中去了。由于所有资本家都同时扮演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产业资本家必须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持有一定量的资本,因此他们就可以随时选择把自己的钱用于扩大生产,或者仅仅将其借给他人,“马克思认为,如果每个人都企图做靠利息或租金生活的食利者,而没有人愿意去生产剩余价值,那么利息率就会降为零。与此同时,投资于生产的潜在利润会提高到一个无法预见的水平。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生息资本的流通必须服务于并且服从于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情形,虽然这只是一种最大化的限制,仅指出了生息资本积累的一个界限”^⑤。我们认为,伊藤诚和拉帕维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9、54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7-578页。

③ David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Two*,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3, p.175.

④ [日]伊藤诚、[希]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孙刚、戴淑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2、82-83页。

⑤ David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Two*,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3, p.176.

斯对马克思的指责是错误的，不能否定马克思在这里对借贷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的区分，而且这种阶级分析方法能够揭示过去 30 多年金融化的一些重要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货币是一种社会权力，掌握这种社会权力的金融阶层形成了强大的阶级力量，他们为维护既得利益而不惜牺牲产业资本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也是金融垄断资本力量的重要来源。

马克思主要研究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从以上两个方面阐述了虚拟资本运动的独立性的来源。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金融化使这种独立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是金融资本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渗透，将家庭和个体作为榨取利润的对象；二是金融创新增强了金融部门自我循环和扩张的能力，特别是通过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三是金融资本沿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将各国金融市场联系起来，建立了国际化的积累机制。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新自由主义重新恢复了上层阶级的权力与收入，使资产阶级与经理人阶级之间实现了结盟，资产阶级与金融机构的上层部分取得了金融霸权^①。

三、资本自主化运动的内在逻辑

虚拟资本过度积累或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可能性已经蕴含在资本的概念之中，是资本内在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资本是在运动中谋求增殖的价值，其本质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资本具有摆脱一切物质束缚实现自由逐利的欲望，资本的这种欲望只有在金融领域才得到了真正的满足。勒达·玛丽亚·葆拉尼等学者用“资本自主化”概括资本形式与内容的背离及其对金融化的含义，从最基本的范畴出发，一步步推导出了资本自主化运动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金融化阶段资本层面发生了哪些变化^②。

葆拉尼认为，金属货币、流通手段和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等资本主义形式^③必然会产生自主化运动，一步步远离具体的社会内容^④。这种自主化运动是马克思的范畴合乎逻辑的发展，其出发点是商品，从商品出发一直到最抽象的金融资本、虚拟资本。葆拉尼认为，使用价值与价值这两种社会形式是永远冲突的两极，其冲突只能通过转移到更高的层面解决，并产生了进一步转移的需要。具体说来，从商品中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出发开始了五个自主化运动：（1）货币产生后，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内部对立取得了外部表现，即这种对立转移到了货币身上——价值开始自主化于使用价值；（2）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需要某种具体性（concrete），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要求它摆脱特殊的、物质的使用价值的束缚，从而导致了抽象性——货币开始自主化于价值尺度所要求的具体性；（3）上一个自主化运动是以使用价值交换为目的的商品—货币—商品流通的自主化，当流通的目的是价值增殖时，货币支付手段和贮藏货币的职能使其可以独立于流通过程而存在——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使其自主化于流通过程自身；（4）在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基础上，信用制度发展起来，使积累过程日益自主化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5）虚拟资本产生后，一切收入流都根据资本化原则还原为一笔资本——资本日益自主化于作为价值增殖运动的资本自身。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货币成为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极大

^① 参见（法）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60 页。

^② 葆拉尼等学者用“自主化”（Autonomization）一词描述资本主义形式独立于其社会内容的倾向。我们借用了这一概念，但主要关注资本的自主化。

^③ 葆拉尼认为，“资本主义形式”一词能准确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虽然一切社会经济结构都具有社会性，因而有相应的社会形式，但资本主义形式倾向独立于与其相对的社会形式，从而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存在对立。

^④ Leda Maria Paulani, “Money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the Autonomisation of Capitalist Forms in Marx’s Theor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8, No.4, 2014.

促进了资本对自身的自主化进程；金融资本（生息资本）日益自主化于实际资本，金融财富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引起了生产领域的深刻转变，使资本形成、增殖过程日益虚拟化。

这五个自主化运动以高度抽象的形式概括了虚拟资本积累脱离实际资本积累或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的内在逻辑。现有的关于金融化、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个方面，如“经济停滞—金融膨胀”解释缺乏理解长期金融化的视角。正如葆拉尼本人指出的，他的推理仅仅停留在范畴层面，“以上揭示的自主化运动只是停留在范畴层面，绝不能假定这里描述的次序与实际的历史过程有任何关联。相反，所有的自主化运动都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进程中，尽管它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等级结构”^①。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演进表明，资本主义商品化、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的发展并不仅仅停留在逻辑推理层面，也符合历史发展进程。无论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马克思之后列宁所处时代的信用制度的极大发展，抑或是20世纪70年代金本位制的取消与80年代以来金融化的发展，都证实了这一点。

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实际上发挥了世界货币职能的美元也成为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这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争论：马克思货币理论中的货币是什么性质，即它是不是一种（包含社会劳动的）商品？葆拉尼以辩证法解读马克思，试图表明可以将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视为社会形式自主化过程的一种实现；商品本身已经包含了这一过程，并从逻辑和本体论上将其推向最为抽象的财富形式，如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因此，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与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完全相容，即使从国际层面看也是如此。从商品到虚拟资本的自主化运动已经包含在《资本论》的分析之中了，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问题（货币的性质、金融支配等）仍然适用。自主化运动源自资本的概念本身，最终造成了劳资关系的变化。葆拉尼认为，过去30多年金融逻辑的主导使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变得更为复杂。与生产形式（通过机器的使用）的隶属不同，这种隶属与积累的形式有关。换句话说，在劳动对资本的隶属中，野蛮的机器不再是最重要的特征，它的位置已经被非人格化的虚拟资本所占据。资本通过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对生产过程，从而对劳动力的控制越来越强。

罗德里戈·阿尔维斯·泰谢拉和托马斯·尼尔森·罗塔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资本自主化分析框架^②。他们将自主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日益摆脱其物质基础和物质内容的倾向，而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社会形式是资本，所以最重要的自主化就是资本的自主化。资本自主化意味着资本企图摆脱并破坏实际价值生产活动来实现增殖，即企图不依靠剥削劳动而增殖，是一个“脱离价值而增殖”的矛盾。泰谢拉和罗塔界定了资本自主化在当代的两个表现维度：金融维度——通过“金融化”实现，生产维度——通过“知识商品”的生产实现。在他们的资本自主化分析框架中，金融化被视为自主化的一个特殊历史产物，是价值对使用价值的自主化，是资本试图使价值脱离使用价值的实际创造与流通而实现增殖的趋势。其他经济学者往往集中于金融化，忽视了资本自主化的生产维度。泰谢拉和罗塔用“知识商品”“知识租金”等概念刻画自主化的生产维度。他们认为，由于知识在生产活动中的系统性应用，资本主义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商品。这些知识商品的创造需要投入大量劳动时间，但一旦研发出来，几乎不需要花费劳动时间就能轻松复制。这一性质使知识商品并不具有价值，即使有更多新的生产性使用价值被创造出来，也并不存在价值的生产，其价格的

^① Leda Maria Paulani, "Money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the Autonomisation of Capitalist Forms in Marx's Theor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8, No.4, 2014.

^② Rodrigo Alves Teixeira, Tomas Nielsen Rotta, "Valueless Knowledge-Commodities and Financialization: Productive and Financial Dimensions of Capital Autonomiz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44, No.4, 2012.

制定具有随意性。知识商品的购买者得到的只是这种商品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获得了特定知识商品使用权的个体资本家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为自己创造了超额利润。像地租一样，这种生产价格的差异使超额利润可以转化为知识租金。知识商品的所有者在国家法律的保护下实现了对知识的垄断占有，以知识租金的形式占有了大量剩余价值，并创造了一种“现代生租资本”。作为资本自主化的生产维度，知识商品同样意味着资本试图摆脱实际价值的创造而实现增殖的倾向，它创造了一种受政府保护且不依赖金融活动的新型食利主义。

与泰谢拉和罗塔的观点不同，我们认为，资本摆脱物质束缚实现自由逐利的欲望只有在金融领域才得到了真正的满足，知识商品的生产无论从逻辑推理还是从现实历史进程来看，都不应该纳入资本自主化的一般规律。首先，虽然资本自主化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只有金融领域能同时满足资本对流动性与增殖性的双重要求，且在原则上不受任何限制。其次，知识商品等渠道的运行往往离不开金融的作用，其收购、抵押等都需要金融的支持。再次，信用制度的存在根植于资本积累过程本身，与生产和再生产有密切的联系，既证明了其存在的正当性，又为它对经济施加控制提供了可能。经济金融化意味着资本日益摆脱了物质外壳的束缚，以金融的方式占有资本与收入。

四、虚拟资本的回归

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和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意味着资本日益脱离了实际价值创造活动，借助金融等手段谋求增殖。前面分别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演进和资本自身的逻辑出发，揭示了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的内在逻辑。虽然虚拟经济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但绝不能认为金融膨胀能够无限进行下去。相反，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和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最终会回归其货币基础与价值基础。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是一个等级制的层级结构，金融现象经过层层中介环节，最终与货币、价值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所谓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货币基础，也就是整个信用制度的货币基础。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货币是整个信用制度的基础，虽然后者有摆脱前者的冲动和倾向，但信用制度永远无法摆脱其货币基础。资本自主化运动使信用日益背离其货币基础，最终只能以危机的形式，通过暴力手段重建这个基础。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①

信用制度与其货币基础的矛盾可以追溯到货币充当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二重功能上，“货币充当价值尺度要求它能真正代表它所中介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它只是作为纯粹的社会劳动的化身而存在……但是作为流通手段，它必须使自己与价值的真实代表相分离，允许市场价格偏离价值，以发挥自己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不断变化的交换过程中充当灵活润滑剂的功能。就这一点来说，纸币和信用货币可以无限制地、创造性地满足要求”^②。资本主义信用制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各种信用货币形式不断膨胀并挤占了金属货币的位置，它们与实际社会劳动的联系越来越微弱。如果信用创造与社会必要劳动相一致，信用扩张对资本积累就是有益的。但是，一方面信用扩张与投机很难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0页。

^②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 pp.292-293.

被阻止，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过度积累问题一直存在，因此利润的实现经常受阻。当虚拟的价值没有社会劳动产品和剩余价值的支持，或人们对信用体系的信心发生动摇的时候，“资本就必须寻找在社会必要劳动的世界重新站稳脚跟的途径”^①。危机使信用制度重新回归其货币基础，货币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价值的真实代表而与所有商品绝对对立，“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同商品相对立……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信用货币的贬值（更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将资本定义为在运动中追求增殖的价值，并取得了自主运动与自主增殖的独立性外观。在讨论价值革命时，马克思指出“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化的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因此，这些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经历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化。”^③ 这表明资本独立运动的外观只是一种假象，它依赖于一系列的客观条件，并不是抽象的运动，而是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资本自主化运动和虚拟资本积累试图彻底摆脱价值增殖的物质束缚，但最终都无法摆脱这种客观、社会和物质的束缚，这在危机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信用制度的货币基础具体指的是什么呢？马克思说过“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我在第一册第三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小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④ 显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充当信用制度货币基础的是金属货币，即黄金。中央银行则位于信用制度与金属货币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中央银行应发挥调节作用，稳定整个金融体系与其货币基础。但作为一种人为的制度，绝不排除它本身扰乱信用制度的货币基础的可能性。对于金属货币在信用制度中的地位，马克思指出“当启蒙经济学专门考察‘资本’时，它是极为轻视金和银的，把它们看作资本的事实最无关紧要和最无用的形式。一旦它讨论到银行制度，一切就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真正的资本；为了维持这个资本，必须牺牲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⑤ 根据马克思的表述，金属货币——金和银——之所以能够充当信用制度的货币基础，在于它们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进一步，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商品，金属货币作为商品价值一般代表的属性使其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因此，位于整个信用制度最底层的是价值，是抽象的社会劳动。价值本身作为抽象社会劳动的化身有坚实的基础，是一种社会存在，但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关系，它采取了难以捉摸，甚至是抽象的形式，“价值和商品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体不同，必然发展为这种没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⑥。

葆拉尼正是从价值的这种社会性出发，讨论了“社会形式”与“资本主义形式”的对立，以及

①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 p.293.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4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8-649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9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资本主义形式”的自主化。马克思指出“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独特的社会的性质。”^① 葆拉尼认为，这段话解释了资本主义形式为何倾向独立于与其相对的社会形式——它试图摆脱阻碍其完整性的所有具体障碍，从而创造了新的冲突层次和新的自主化形式^②。

五、结 论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虚拟经济背离与回归实体经济的内在逻辑。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的解释往往将之归因于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后，过剩资本在金融领域寻找出路，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种解释是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辩证关系的僵化理解，对金融化的理解也缺乏长期的视角。资本主义下虚拟资本积累本身就具有脱离实际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分析已经蕴含了这一点。一方面，马克思揭示了货币产生以后出现的双重积累体制相背离的可能性，即虚拟积累独立于现实积累，从而产生过度积累问题。同时，马克思在考察生息资本运动时采用了一种阶级分析的思路，即在资本家阶级中区分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前者有取得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资本的本性来看，资本具有摆脱一切物质束缚而实现自由逐利的欲望，即通过自主化运动逐渐远离价值增殖的物质基础，现代金融创新大大增强了资本的这种自主性。

虽然虚拟经济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本文也特别强调了其独立性的一面，但绝不能认为金融膨胀能够无限进行下去。相反，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和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最终会回归其货币基础与价值基础。

参考文献:

- [1] 〔美〕大卫·哈维 《马克思与〈资本论〉》，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 [2] 栾文莲、刘志明、周森 《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与世界金融危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 [3] 王守义 《经济金融化趋向及其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启示——基于1973—2017年美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0期。
- [4] 黄群慧 《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9期。
- [5] 谢富胜、李安、朱安东 《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 [6] Tomas Nielsen Rotta, Rodrigo Alves Teixeira, “The Autonomisation of Abstract Wealth: New Insights o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40, No.4, 2016.

(编辑: 黄华德)

①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3-84页。

② Leda Maria Paulani, “Money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the Autonomisation of Capitalist Forms in Marx’s Theor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8, No.4, 2014.